

脉此田疇故不醒故尊礼矣  
不以作考惟愧矣在布生珉尚  
其後者紀告王宋也歎送古之

胡翔龙◎著

# 梁鼎芬

广东历代书法家研究丛书



# 梁鼎芬

Liang Dingfen

胡翔龙◎著

广东历代书法家研究丛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梁鼎芬 / 胡翔龙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2017.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地方历史文化特色  
项目

ISBN 978-7-5362-6104-4

I . ①广… II . ①胡… III . ①梁鼎芬 (1859-1919) —  
人物研究②梁鼎芬 (1859-1919) —书法评论 IV . ① K825.72  
②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1208 号

责任编辑：刘向上

助理编辑：彭 辉

责任技编：许伟群

书籍设计：李卉仟如

## 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 梁鼎芬

---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com）  
(广州市文德北路 170 号 3 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7.5

插 页：4 页

印 数：1—1000 册

ISBN 978-7-5362-6104-4

---

定 价：88.00 元

# 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林 雄

编委副主任

顾作义 白 洁

编委会成员

廖曙辉	倪 谦	张桂光	纪光明	丘仕坤	吕伯涛
李小如	李远东	许鸿基	陈钦硕	周国城	周树坚
陈志平	戴 和	李健军	刘向上	黄 勋	

主 编

廖曙辉

副主编

纪光明 陈志平

统 筹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 总序

PREFACE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先进文化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其中重要一环还在于文化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先继承，因此整理和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毛笔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壮丽而多姿的独特文化景观。岭南书法也曾经有过辉煌和灿烂，从先秦至南越国时期，便有墨书、陶文、砖铭和木刻等传世；随后，秦砖汉瓦、晋铭隋碑层出不穷。由于气候潮湿等原因，故有墨迹可寻者晚至南宋；逮至明代陈献章出，书坛代不乏人。明清以来，佛门大德、文苑精英、学界耆宿、政坛闻人，或留心翰墨，或雅善丹青，文心诗骨，彬彬大盛。这个时期是岭南书法史的黄金时代，不仅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而且剧迹腾涌，形成了抗衡中原，颉颃江左，而雄视全国的新局面。先后涌现了梁佩兰、苏珥、黎简、冯敏昌、谢兰生、吴荣光、李文田、朱次琦、邓承修、简朝亮、

001

梁鼎芬、康有为等一大批极富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书法作为一份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她的文化穿透力将随着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北负五岭，南濒海洋，史称岭南。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岭南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岭南历史上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杰出人物，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务实进取、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

近几年来，广东为了建设“文化大省”，在继承和弘扬传统书法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其中尤其为人所称道的是广东省历代书法展览和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览的成功举办，显示了广东人发展书法文化的智慧和决心。岭南书法一直以来就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岭南书法的专家学者，如叶恭绰、麦华三、马小进、黄咏雩、李健儿、李仙根、冼玉清、王秋湄、马国权、汪宗衍、陈永正、林亚杰、朱万章等，他们或组织展览，或编著图录，或钩稽文献，或著文论议，诞生了像叶恭绰《广东文物》和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等一批代表论著。90年代末至新千年初，以岭南书法为主题的研讨会相继举行，尤其是配合“广东历代书法展览”而召开的“岭南书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及《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丛书》的顺利出版，更是全面展示了广东人在整理研究乡邦文献和发展弘扬书法文化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此基础上，书法文化的保护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全面，由被动走向主动，由静态走向动态。

为了推进研究，繁荣学术，配合广东书法的对外宣传，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组织编写本套以岭南历代书法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丛书。并经省社科院专家评审，列入“十一五”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我们拟选取岭南书法史上的数十位名家分别进行研究和评述。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拟先涉及岭南书法历史上的20余位书家，他们是：陈献章（1428—1500）、天然函是（1608—1685）、澹归今释（1614—

1680)、屈大均(1630—1696)、梁佩兰(1629—1705)、陈恭尹(1631—1700)、宋湘(1757—1826)、吴荣光(1773—1843)、朱次琦(1807—1882)、陈澧(1810—1882)、李文田(1834—189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叶恭绰(1881—1968)、王秋湄(1884—1944)、邓尔雅(1884—1954)、邹鲁(1885—1954)、容庚(1894—1983)、吴子复(1899—1979)、商承祚(1902—1991)、麦华三(1907—1986)等。

丛书编撰体例大致以介绍及评述书家生平事迹、重要交游、理论贡献、创作成就、书史影响等几个方面为主，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本套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以后将陆续介绍岭南书法史上的其他名家，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一套完整的岭南书法史人物研究的画卷。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一定能为岭南书法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也能为广东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001
第二章	家族斋号 / 011
第三章	生平述略 / 017
第四章	书艺嬗变 / 031
第五章	款印考释 / 045
第六章	篆书考证 / 049
第七章	在清末“碑帖之争”中的立场 / 053
第八章	梁鼎芬师友书学观 / 063
第九章	艺术风格 / 073
附录一	参考文献 / 077
附录二	梁鼎芬年谱 / 083
附录三	作品欣赏 / 113
后记	/ 117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有清一代，历经十二位皇帝，自 1636 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至 1912 年逊帝溥仪退位凡 276 年。建朝伊始，全国动乱不安，清帝除了在武力上以种种形式镇压之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文式策略，如恢复科举考试、大批量吸收汉人入朝任职、大兴文字狱等。在安抚汉族知识分子和巩固自身政权的同时，使得汉族文化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历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核心。清政权建立之后，其书法风格仍然以延续明朝书法为基点。明人书法可总结为“衍魏晋、得唐宋、承元法”。黄惇先生曾把明朝书法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成化年间为前期，元代遗民中以宋克最为耀眼，另外以沈度为代表的台阁体书家群人数虽盛，但书风大体平庸无味，故此一百多年在明朝书史上是漫长的低潮期；从弘治，历正德、嘉靖至隆庆时代的 84 年可视为中期，以文徵明、祝允明为代表书家的这一时期是从低潮转向高潮的时期；万历以后直至明末可视为后期，以徐渭、董其昌、王铎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时期。”<sup>①</sup>从书风的分类上，大抵可以分为两大书脉络：以“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的馆阁体书家到中期的“吴门书家”再到晚明的董其昌为第一条脉络；以陈璧、张弼为代表的明初期狂草书家到中期的祝枝山、陈淳、徐渭再至晚期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为代表的变革书家为第二条脉络。时至清代，上述两条脉络书风皆有延续和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极其喜好王羲之书，由此，王羲之一举登上书法最高宝座成为“书圣”，可见帝王之好意义非凡。清初亦是如此，康熙极好并大力推崇董其昌的书法，使得科考取士尽显董书，满朝上下甚至以董书论高下。由于帝王之好，民间大肆搜罗董字或加以研习或用于讨好天子。第二条脉络则为王铎、傅山等人以不同的形式入清之后，各自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发挥着作用。作为明朝遗老，他们虽

<sup>①</sup>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 173 页。

然在政治上并不能真正地大显身手，但其书法依然有着较强影响力，虽然书名在当时居位不高，但也为大批论书者所关注。梁巘在《评书帖》中有言道：

董元宰、张得天直接书统，卓然大家。……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味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sup>①</sup>

翁方纲在《复初斋书论集萃》里的《跋王觉斯书》一文中又谈道：

……观此卷乃知王觉斯于书法亦专骋己意，而不知古法也。夫真、行、草理虽一贯，而格必兼通，未有不精楷而能作行草者，亦未有不博通行草而专精真楷者。若王觉斯之真楷，则有时争胜董文敏，而其率意行笔则逊之远矣。<sup>②</sup>

可见王铎书法在当时的时风影响下，虽然备受关注，但其名、其书皆在董其昌之下，甚至远远不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王字带有叛逆、自由和不受拘束之风，与当时清政府急切地稳定统治及恢复秩序的政治需要显然格格不入。在这种压力下，以王铎为代表的此类书风在清中前期一直压抑着。

乾嘉时期，乃清代帖学的鼎盛期。浓墨宰相刘墉淳古端庄、淡墨探花王文治纤细俏丽、梁同书圆润俊逸、翁方纲严正平和，这些帖学书家一方面尽力摆脱贫末一直延续至康熙末年的“崇董”之风，另一方面涉足其他取法范畴，使得这一时期的帖学书风呈现出一片繁华和丰富的景象。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金石学和小学也颇为兴盛，尤其

<sup>①</sup> 清·梁巘《评书帖》，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899页。

<sup>②</sup> 清·翁方纲《复初斋书论集萃》，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955页。

以“乾嘉学派”<sup>①</sup>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书风也受其影响很大，人们对于篆隶和碑版的临习日益成风，比如在篆书、楷书、篆刻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突破，如邓石如、赵之谦等人。

清代金石学研究是继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又一高峰，成为金石学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金石学的再次兴起，激发起很大一部分书家访碑、研碑的兴趣，甚至成为一时风气。加之当时处在大兴文字狱之时，学者们不敢对当朝有片言之议，唯恐以半字之罪下狱，更加剧了学者们对考辨和访碑的兴趣。一时之间，《散氏盘》《石鼓文》《琅琊台刻石》《西岳华山庙碑》《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等名碑成为书家们争相临摹、摹刻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多本以碑版过眼录为要的著作出现，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郭宗昌《金石史》、武亿《金石三跋》、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大量的图版资料和著录出现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浸淫碑学而又以碑学名世的书家，邓石如、伊秉绶、丁敬、桂馥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从这一时期开始“碑学”正式踏入清代书家们的家门，与“帖学”共处一室。

嘉庆年间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书论相继问世，在论述中不但确立了北碑的地位，更为之大力倡导一番。其中值得肯定的两点是：首先，他将书法分为碑、帖两类，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将书法明确地分为两种流派；其次，他的《南北书派论》，亦可视为地域书风理论创立的标志。书分为南北二派虽不是阮元所创，早在宋朝就有书家赵孟坚提出过：

晋、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护襄阳《启法寺》《兴国寺》二石……

<sup>①</sup> “乾嘉学派”是指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研究方法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亦可称为“汉学”。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有“朴学”“考据学”之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

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sup>①</sup>

但阮氏却是第一位系统地、全面地阐释南北书派这个问题的人。他曾在《南北书派论》中谈道：

南朝诸书家载史传者，如萧子云、王僧虔等，皆明言沿习钟、王（萧传云：“子云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变字体。”王传云：“宋文帝谓其迹逾子敬。”），实成南派。至北朝诸书家，凡见于北朝正史、《隋书》本传者，但云“世习钟、卫、索靖，工书、善草隶，工行草、长于碑榜”，诸愈而已，绝无一语及于师法羲、献。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为北派所分，非敢臆为区别。<sup>②</sup>

以典籍的依据来进一步说明北派书法的渊源。阮氏此言一出，即得到众学者们的赞同，如梁章钜、钱泳等人皆大发赞口，但将阮氏碑学主张真正发扬光大的是包世臣。包氏出生在盛产宣纸的安徽泾县，自幼习书，虽初以俗书“馆阁体”入门，但因用功甚勤初备书底。后得邓石如点拨，临习欧、颜、苏及《书谱》，博采众长加之躬耕不辍，得以在笔法上大有长进。嘉庆二十四年（1819）包氏客居济南，此时期他得见众多北朝碑版，然后用自己多年的书学功底将所见碑版逐一进行判断和对照，并撰文《历下笔谭》传世。

《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意在强调北派书风是客观存在的并加固其合理性，同时号召众人重视北碑，旨在扭转帖学的积弊造成书风靡弱。包世臣通过对照碑版，详加论证北碑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等方面，如：

<sup>①</sup> 宋·赵孟坚《论书法》，见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第157页。

<sup>②</sup> 清·阮元《南北书派论》，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1042页。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李仲璇》《敬显俊》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隋《龙藏寺》庶几绍法，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sup>①</sup>

又如：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豪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长史之观于担夫争道，东坡之喻以上水撑船，皆悟到此间也。<sup>②</sup>

由此可见，包氏通过《艺舟双楫》把阮元的“倡碑论”进一步抬高，但抬高的同时也在技法和审美趣味上突破了帖学法则，甚至贬低：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sup>③</sup>

不仅如此，包氏将自己的恩师当朝篆隶大师邓石如一举推为当朝神品的唯一一人，其余书家皆在邓氏之下。包氏对神品的定位为“平和简净、述丽天成”，由此可见，他能将路边野书招牌归为妙品行列也就不足为奇了：

又在都下前门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见火镰店柜上立招牌两块，有“只

<sup>①</sup>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089页。

<sup>②</sup> 同①。

<sup>③</sup> 同①。

此一家，言无二价”八字，字径七寸，墨书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书优入妙品，询之不得主名，附记于此。<sup>①</sup>

这一时期，不仅论书者多书论繁，而且在书法创作上也不落人后。羊毫笔与生宣纸在乾嘉时期兴起，此时已经广泛运用至各种书体中，羊毫笔与生宣纸的盛行也与碑派书法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篆隶两种书体的复兴带动了碑派书法的崛起，而这两种书体皆为线条长而润，行笔需力稳，墨色需均匀。若再行使用硬毫与熟宣纸定不能达到秦、汉碑刻的精神气韵，书写不出古朴沉厚的金石效果。因硬毫笔锋短腹瘪，蓄墨能力不如羊毫笔强；熟宣纸墨不入纸，不能像生宣纸一样出现更为明显的墨色效果。上文提及，碑派书法经过包世臣等人的鼓吹，已经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碑派书学理论，其中也不乏对技法上的要求。刘恒先生曾经对其技法总结过：“用笔要肘腕俱悬，管随指转，运笔须平铺笔毫，中锋用逆，墨色取浓重饱满，燥润相间，点画求中实气满，遒厚凝重，最终理想是远接秦、汉传统，引篆、隶遗意入真、行。”<sup>②</sup>从书家的实践来看，吴熙载、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等人皆是当时运用长锋羊毫的领军者，其书名也广播海内外。其中最为盛名的还应为包世臣的恩师邓石如，邓氏的篆隶不仅在清代享有盛名，时至今日都为学习篆书者提供着良碑佳帖。从邓氏的作品来看，篆书字形稍长而略方，笔势轻松流畅且入纸凝重；隶书用笔铺毫直行，裹锋逆行、遒劲爽利，这也恰好与包氏的理论体系相互照应。邓氏的楷、行、草书在笔者看来的确难以登堂入室，与其篆、隶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清代末期，碑派书法发展至鼎盛时期。鼎盛时期的产生就必然不能绕离另一位碑派书法的大力鼓吹者——康有为。1889年，康有为论书巨著《广艺舟双楫》横空问世，并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举成为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

<sup>①</sup>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095页。

<sup>②</sup>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240页。



等论书巨著之后又一书坛巨作。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其书学观点的人，皆对其书表现出很大关注。正如刘恒先生说：“从其在短短的七年中就先后印刷了十八次这一事实上，足可以推见其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sup>①</sup>全书涉及面十分广，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皆有涉及。《广艺舟双楫》全书共二十七篇，凡六卷，前言叙目一篇，该书集书法源流阐释、学习途径指导、风格特点鉴赏、用笔方法考证于一体，可谓清代以碑学为出发点的集大成之作，但其书中观点颇为极端，甚至曰：

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sup>②</sup>

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sup>③</sup>

而现实中，康氏所提倡的“尊碑抑帖”这一观点，虽然在其时给“帖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并没有影响到很多人。从康氏当时交游的翁同龢、梁启超、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的书风而言以及他们对书法的态度来看，此一时期书坛不仅仅关注碑派书风，对帖派书风的研习热情也并没有消退。

清末的刻帖数量是有史之最，刻帖的目的是销售给文人书者得以临摹和学习。曹建先生曾说：“晚清刻帖远比宋、明及清前期为多，数量占据绝对优势，整体上呈现繁荣局面。”<sup>④</sup>本时期的刻帖不仅数量惊人，其质量也为上乘，甚至出现了文玩现象。《兰亭序》的刻帖虽然可以上溯至唐太宗时期，但是缩刻技术在清末首次出现，著名的金石学家、书画收藏家潘世成曾有跋尾道：

①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254页。

②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第36页。

③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第185页。

④ 曹建《晚清帖学研究》，天津美术出版社，2005，第213页。

缩本禊序，或云褚河南、欧阳率更亦曾为之。今世传玉枕本有右军临小像者，乃贾秋壑客廖莹中所缩模。当景定时，贾氏柄国，凡兰亭之在世者，鲜不资其玩好。<sup>①</sup>

可见，康有为所言“帖学大坏”和“碑学笼罩”在该时期并非属实，是为了迎合他政治上的求变，晚年他对帖学进行了重新审视，又回到了“以帖为尚”的主张。<sup>②</sup>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历史学上把这一年定位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王朝从这一年起，战事不断、祸事连连，使其更加摇摆在风吹雨打之中，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中法战争等战事及《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溥仪退位，封建统治画上了句号。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南北对峙，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及经济生活陷入绝境。文人士大夫在这一时期内，或努力承续清朝正统，或转战上海、江南富庶一带以书画换钱财果腹，或投身革命参加武装。帝师、政客、诗人、书法家梁鼎芬便生长在这个混乱的时期。

① 容庚《丛帖目》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780页。

② 拙作《从康有为的帖学观看清末帖学发展的现状》，刊于《书法导报》，2013年第11期。